

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歷史背景

共同科講師 張永楨

摘 要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採行，實在是民國初年以來環境趨勢的促成。因民國初年軍閥的混戰，導致國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到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國內知識份子思想的變動，造成社會主義思想的風靡，而此時又逢蘇俄革命成功，正想貫徹其世界革命的馬克斯思想，中共遂於民國十年在蘇俄的扶植下誕生了，蘇俄由於革命成功不久，爲了爭取中國的承認及進行其侵略中國之企圖，乃連續對華發表友好宣言，使得國人對俄國的仇恨漸轉友好。所以在聯俄容共的前夕，整個社會環境都充滿了友俄及社會主義空氣。

在這種友俄及社會主義思想彌漫的環境中，又巧逢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失去了地盤和武力，遠走上海。當此孫中山孤立無援，苦無良策之時，蘇俄正因在東歐進行共產主義獨立活動遭到挫折而轉變策略，進行與他黨聯合的世界革命，蘇俄在中國與其他軍閥勾結失敗後，遂對孫中山伸出友誼的雙手，孫中山在那艱困的處境下，經過一番思考後，終於決定聯俄。而蘇俄扶植下的中共，因正逢鐵路工人罷工的群眾運動失敗，終於在蘇俄的命令下加入了國民黨，使聯俄容共成了事實。



Abstract

The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from the early 1910's on made the KUOMINTANG become alli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USSR in 1924. The civil war between warlords resulted in citizens' demanding the political reform.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ok a great interest in socialism. In the meantime Russia succeeded in revolution and wished to carry out Maxism all over the world. In 192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founded with the help of Russia. In order to obtain recognition from China and make the attempt to invade China, Russia, after revolution, made friendly declamation to China many times. Therefore on the eve of Chinese alliance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USSR, the Chinese society was filled with friendship to Russia and socialism.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friendship to Russia and the pervasion of socialism, it so happened that Ch'en Jeong-Ming defected from the KUOMINTANG; Sun Yat-Sen went to Shanghai because of the loss of territory and arms. Russia performing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met with frustration; therefore, Russia was allied with other parties to carry out the world revolution.

Became Russia's alliance with Chinese warlords failed, Russia gave a friendly hand to Sun Yat-Sen, 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Sun Yat-Sen, through careful consideration, decided to become allied with Russi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ailed in the strike of railway workers. Therefore, Russia order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join the KUOMINTANG. The KUOMINTANG's alliance with Russia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e true.

關鍵字：五四運動 (May Fourth Movement)，國民黨(KUOMINTANG)，陳炯明 (Ch'en Jeong-Ming)，孫逸仙 (Sun Yat-Sen)。



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歷史背景

第一章 前言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正式宣布聯俄容共以後，中共在蘇俄的指使下，企圖劫取國民黨的政權而導致寧、漢分裂，最後終有民國十六年的清黨運動。聯俄容共後，曾因國、共的衝突而使國民黨以武力統一中國的北代事業稍稍遲緩（註1）。因此，許多人對聯俄容共政策的採行，毀譽交加，有認為此乃孫中山的乾綱獨斷之舉（註2），也有人認為這是孫中山逢陳炯明叛變的權宜之計（註3）。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則認為：「我堅決的認為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即對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註4）。其實，不論聯俄容共的導致的結果如何？但聯俄容共政策的採行，乃時勢所趨。本文即嘗試透過各種角度去分析孫中山採行聯俄容共之原因，希望藉此能對歷史的真象多一份瞭解。

第二章 聯俄容共的遠因

第一節 國內知識份子思想的變動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中國激起了廣泛地革新浪潮，作為時代先鋒的知識份子，由於對北京政府的憎惡與對世界列強的憤恨，乃對新政治與新社會的追求表現出熱切的希望，就在這種革新觀念的要求下，凡改造新社會的學說遂大受歡迎。因此，在民國九～十年間，中國普遍吹起了一陣社會主義的旋風。報章雜誌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汗牛充棟（註5），學術界也成立了不少研究社會主義的團體（註6）。潘公展在其「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一文中，對於當時社會主義的流行，有如下的敘述：

「一年以來（指民國九年）以來，社會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起風起雲湧了。報章雜誌的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斯主義，西也是討論布爾希維主義；這裡是闡明社會主義的理論，那裡是敘述勞動運動的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彷彿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註7）。

社會主義之所以能風行一時，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俄國革命的影響，另一則是日本在戰後社會主義思想昂揚。前者刺激了中國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研究的興趣，後者則由於大量社會主義書籍的日文譯本湧入中國，增加中國知識份子研究社會主義的方便（註8），就在這股社會主義的旋風中，中共終於在民國十年誕生了。這股社會主義的思潮，雖無法證明其對聯俄容共政策的採行有直接的影響。但它卻生產了國民黨容納的對象——中共。同時由於一片社會主義的狂熱，也間接促使聯俄容共成為可能。



第二節 民眾對政治改革的要求

民國初年的政局，是一個軍閥混戰的世界。而各軍閥又各挾帝國主義者為背景，互相攻伐，在這種情形之下，受苦受難的是無辜的百姓。因此，一般的老百姓均有改革當前政治的要求，例如聯省自治運動的醞釀以及全國統一的企求均為當時一般民眾的普遍心理（註9）。

在這種情形下，很自然的，孫中山乃加強並加速了他重振革命陣容的決心，以新的號召，新的部隊，新的組織來為國家民族打開一條出路。因為當時軍閥割據的勢力遠較革命武力強大，而勾結利用他們的帝國主義者更把國民革命的政權窒息到氣都透不過來（如操縱關餘，即其中之一小項而已），有非置之死地不可之勢，所以當時國民革命的領導集團不能不採用新的外交姿態，以應付這惡劣的局勢，而蘇俄與中共都是主張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所以孫中山聯俄容共，企圖來增加國民革命的實力。

第三節 推展世界革命是共產國際的陰謀

民國六年蘇俄共產黨推翻帝俄，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便開始進行其世界革命的目標。因為列寧曾說：「蘇俄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團結各國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團結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運動。』（註10）因此，為達成此一目，『列寧侵略世界的戰略，是先向敵人的弱點進攻，列寧認定亞洲——特別是亞洲的中，為其敵人的重要弱點。所以他說：「從北平到加爾各答，是莫斯科通往歐洲最近的路」（註11）。因為蘇俄共黨的這種歪曲思想，引導著蘇俄侵略中國的藉口，終於在中國參養出其螟蛉子——中共。企圖假中共之手，來完成其侵略中國的陰謀。而在其滲透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曾企圖勾結張作霖、馮玉祥、吳佩孚等軍閥來達成其侵略的目的，但均未得要領（註12）。因此，最後乃決定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孫中山的國民黨也因而成為蘇俄進行世界革命、貫徹侵略中國之野心的橋樑。

第四節 國人對俄國觀念的轉變

帝俄時期，俄國對中國展開一連串的侵略，北京、瓊瑋．．．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深深地創傷了中國人的心靈，使得國人對俄國懷著極大的仇恨。但是民國六年俄國革命以後，蘇俄政權為了要爭取中國對蘇維埃政權的承認，曾於民國八年、九年，先後兩次發表對華友好宣言（註13），不但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並且主張所有民族完全自由平等。這些宣言，在當時列強環伺的局勢裡，確收到相當地效果。中國人民對俄仇恨的觀念都漸漸的改變，一般知識份子因深受列強壓迫的影響，從而對俄表示好感。民國九年，北京二十九校代表決議「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蘇俄政府表示親善之意」（註14），全國報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各界聯合會，上海各界聯合會等數十團體，也先後發表文電，讚揚蘇俄的友善表示，要求北京政府迅速予蘇俄以外交承認（註15）。孫中山在此全國迷俄的風潮中，雖然懷疑蘇俄的誠心，但也確認其有助於風氣的改善與革命聲勢的增強。所以民間友俄的心理趨勢構成了共產組織發展的助力，也伏下了各實力派有



意與蘇俄接近的引線。這個局勢發展的結果促成聯俄容共的可能。

第三章 促成聯俄容共的近因

雖然民國十年左右，整個局勢充滿了聯俄容共的誘因，但是當時的中共最初並沒有加入國民黨的打算。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甚至決議：「對現有政黨，應採取獨立、攻擊、排他的態度。在政治鬥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及官僚主義中，在要求言論、出版及集會之自由中，當吾人必須表明我們的態度時，本黨應堅守無產階級的立場，並不准與其他黨派建立關係」（註16）。由此可見中共早期對國民黨的敵視，即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也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因為他認為國民黨的入會方式採按指模的原始幫會型態，而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專制的，不合民主原則，一切大事最後決定權在於孫中山。但是這種敵視國民黨的態度到了民國十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時卻決議：「協助勞動階級是中國共產黨之主要方針，吾人參加國民黨戰線，能使勞動階級一始就可獲得政治權力。因此，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是我們的主要政策之一」（註17）。

從此中共採與國民黨組聯合陣線的主張，但是國民黨反對與中共組聯合陣線。當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馬林到桂林晉見孫中山「力促國民黨與共產黨聯盟」，中山先生卻鄭重地告訴馬林「共產之在蘇俄行之，而在中國則斷乎不能」。僅允與蘇俄「作道義上的聯絡」（註18）。另外，國民黨視中共之聲勢太小未成氣候，亦為不願與其聯合之一因。但是到了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卻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且不按指模，這在國民黨而言是一件大事，因黃興曾與孫中山因按指模入會方式起爭執，當時孫不肯與黃興妥協，但現在卻與中共妥協，其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原因是什麼呢？簡單地說，這是局勢的促成。我們試加探究當時的時勢，便會發現整個政局在促成聯俄容共的進行。

第一節 國民黨處境的艱困

第一項 陳炯明的叛變

民國六年，張勳發動復辟事件後，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最初依靠滇、桂系軍閥的支持，革命勢力甚弱。滇、桂系軍閥不過想假借孫中山的名義，在南方自樹勢力，以求自保，並無意獻身於統一中國之大業。孫中山在廣州一籌莫展，於民國七年退居上海。後陳炯明把桂系勢力趕走，孫中山再回廣州，並策劃北伐大業，不意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砲轟觀音山總統府。陳的叛變，使得孫中山再度失去革命的武力與地盤而流浪上海。也給國民黨及孫中山一次沈痛的教訓：

由於陳炯明的叛變，證明了健全國民黨組織與紀律的必要。國民黨傳統的組織精神是以主義為號召，以道義為基礎，而以孫中山個人的人格與威望為團結內部的中心。中山先生對黨員之有歧見異行者，惟以說服而感化之，向未予紀律之制裁。此種精神，在安樂時期，固無足慮，在患難之際，則不足以規範黨員之行動，甚至為野心家所利用。陳炯明的



叛變證明了純粹以道義黨的生命是不夠的，國民要完成艱鉅的革命任務，首先應當健全組織，嚴明紀律。

稟於這些沈痛的教訓，中山先生決心整頓國民黨的黨務，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改進國民黨的宣傳，尋求國內外可能的同情與援助，以奪回廣州並建立新的基地，以爲對內對外擴展其革命計劃的憑藉。

第二項 孫中山企圖爭取外援的努力

民初年的政局是一軍閥混戰的局面，而「當時帝國主義在勾結軍閥，以與國民革命爲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之進行」（註19）。此時孫中山亟思北伐，而北伐的障礙爲軍閥，而軍閥的後面卻是帝國主義，如張作霖的後面是日本；吳佩孚、孫傳芳的後面是英國；即如陳炯明的叛變，亦由於吳佩孚勾結英國的指使，使國民革命勢力，處處受到打擊。國民黨中央曾有聯德以對抗諸列強的打算。可惜當時德國當大戰失敗之後，無力顧及遠東事務。後來孫中山又想聯美，甚至已有所接洽，美國總統威爾遜雖主張「民族自決」，但是美國人民則走向孤立主義的路線，對中國也缺乏興趣。到於英、法、日等國，孫中山雖曾與其有所接觸，但亦不能得到有力人士的支助。就在這苦無援手之，俄國共產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助東方民族獨立爲號召。孫中山得到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爲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關鍵（註20）。

除此之外，如與蘇俄聯合尙可獲得俄援，俄援的內容據韋慕庭先生研究，俄援可分爲武器，金錢和顧問人員三方面（註21）。孫中山在此窘迫無援之際，能獲此援助，對其聯俄容共的決定有其極大的催策作用。

第三項 與中共爲敵不如引之爲友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曾經決議：「對現有各政黨，應採取獨立、攻擊、排他的態度」（註22）。另外參加此次大會的陳秋潭曾說：

「包惠僧認爲共產黨與孫逸仙代表兩個完全相反的階級。兩者之間是無法妥協的。因此，對待孫逸仙應該與對待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嚴厲點，因爲孫逸仙僅憑其煽動能，根本拒絕群眾於門外」（註23）。

由此可見，中共最初對孫中山及國民黨策態度並不友善。如今中共突然決定加入國民黨，當時中共勢力雖弱，但孫中山如果拒絕其加入國民黨，則中共勢必獨立發展，此不僅分散了革命力量，且必然成爲國民黨之敵；如允許中共加入國民黨，中共可能即被溶於國民黨，不但消滅了敵人，而且壯大了國民黨的聲勢，決定聯俄容共的態勢如此，故「聯俄容共」在當時成爲必要採行的一種政策。

第四項 國民革命屢遭失敗的檢討

孫中山在民國初年所進行的國民革命，由於不太注意群眾運動（註24），也沒有嚴



密的組織，通常由領袖運動祕密社會、運動軍隊，甚或運動國會，但祕密社會另有領袖，也不能體認革命的目標，其與革命勢力建立聯繫，大部份是受金錢的左右。而一般民眾由於長久處於西分五裂的局勢中，任憑軍閥官僚的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國民因此失去了政治的目標。孫中山經過多次革命失敗後的經驗乃知群眾基礎之重要，其在民國十二年的演講中說：

「我們從前手無寸鐵，何以會革命成功呢？就是由於宣傳力。革命以後，大家有了軍隊，有了政權，以為事在實行，不必注意宣傳。豈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傳一道，可惜大家都忘了，現在我們要反省才好」（註25）。

由此可見，民國以後，國民黨人一般缺乏宣傳爭取群眾的意識。相反地，中共卻是以群眾運動為著眼點，建黨以來，發動一連串的群眾運動（註26）。而蘇俄革命的成功，亦提供群眾運動成功的例證。因此，孫中山於檢討過去革命失敗原因之後，難免想借重蘇俄革命的經驗與中共群眾運動的基礎來發展其革命事業。

第二節 蘇俄世界革命策略的轉變

第一項 東歐共產黨獨立活動的失敗

中共雖然於民國十年在蘇俄的扶植下成立，但中國為一經濟落後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極其微弱，事實上中國缺乏共產主義活動的條件；因此如何使中共迅速發展以為對中國進行「革命征服」的有力工具，就成為莫斯科當局的一大問題。後來因為德國、匈牙利、芬蘭、保加利亞等國共產黨以真面目獨立活動完全失敗的悲慘教訓，以及爪哇共產分子利用當地民間政治集團作為掩護馬克斯主義運動的外圍組織，深入群眾，吸收同志，獲得初步成功的經驗；於是民國十一年，第三國際就決定今後各國的共產黨，應極力避免單獨行動，務須和既成左傾政黨合作，利用它來遂行「革命征服」陰謀，尤其是在經濟條件落後的東方各國，工人階級稀少，一般人民很難與馬克斯主義發生直接關係，利用一個媒介，以便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更是特別重要。基於這一點，民國十一年六月，第三國際就派遣原在爪哇工作具有經驗的馬林前來中國策動中共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計劃。

第二項 蘇俄勾結軍閥的失敗

當第三國際決定各國共產黨，應避免單獨行動，務須和既成左傾政黨合作後，蘇俄首先看上的就是吳佩孚。根據周佛海的記載：

「共產黨因為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他一個『開明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卻和孫洪伊關係密切。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稽查為包惠僧、津浦線似乎就是李民治……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陈炯明媾議。陳炯明……特召陳獨秀赴粵為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為轉移。……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



元，給陳公博辦『群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馬林和譚平山等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砲擊觀音山，危害孫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聯。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註27）。

陳公博對於中共勾結軍閥一節，也有記述。他說，他曾陪陳獨秀到惠州去見陳炯，之後，「仲甫先生在回滬之前一日，約我在宣講所談話。他說廣東不久必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論道理應當聯孫，論力量是應當聯陳，問我有什麼意見」（註28）。

「據海隅孤客的解放別錄說：那一次惠州談話，陳獨秀力勸陳炯明加入中共，領導華南發展，謂要幹不能全靠軍隊，必須以廣大的工人群眾爲基礎。陳炯明則表示反對，認爲不能拿勞工做政治本錢，這惡風一開，往後將不可收拾，他們同意的，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那一套，因此雙方談得無結果陳獨秀才快快而退，這是後來中共不聯陳而聯孫的最大原因」（註29）。

由此可知，中共確實曾與吳佩孚、陳炯明等軍閥勾結，但是後來碰到了困難和失，最後才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

第三節 容共前中共的處境

第一項 共產國際的指示

蔣介石在其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曾明白指示共黨必須寄生於國民黨內以維持其生命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第一個典型的附庸」（註30）。

早在民國九年，第三國際的第二次世界大會，即爲在其隸屬下的各國共產黨的發展路線，作成決議，中共的成立遲在第三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之後一年，自然要遵循這個決議，走寄生的路線。

第二項 工人運動受到挫折

民國十二年，中共因與吳佩孚勾結，乃掌握了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六條鐵路，遂於二月七日策動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吳知此罷工爲共產黨所爲，即令大捕



共黨分子。計被槍殺者三十九人，判刑者四十餘人，開除工會各級負責人千餘，各鐵路工會一律解散。中共遭此挫敗之後，鑑於北方反赤力量太大，乃決定南下活動，促使容共更爲可能。

第四章 聯俄容共政策的反勢力

第一節 國民黨份子的疑慮

當孫中山考慮容共時，曾徵詢汪兆銘、廖仲愷、胡漢民等人的意見，他們都是孫中山的左右手，國民黨的核心人物；但他們的見解頗不一致。汪兆銘當時對於容共深具戒心，他說：「共產黨徒如羸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危險。譬如西遊記上說：孫行者跳入豬精的腹內，打跟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註31）。

廖仲愷則極端贊成聯俄容共，他的理由是：

「世界各國和中國都不能聯絡，我們在國際上正缺少朋友，現在俄國既誠心和我們聯絡，我們便不應該拒絕它的黨徒」（註32）。

胡漢民的態度則較爲中庸：

「當時正值歐戰以後，中國的社會問題驟然風起雲湧。本黨從未提倡民生主義，而以前許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馬克斯主義者是誠心與我們合作的，便容他們加入本黨，也未嘗不可，譬如某某先生等，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在本黨裡面也未必不能忠於三民主義，爲本黨努力」（註33）。

另外，在上海的國民黨人；對於容共一事，多存疑慮。他們曾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在上海本部召開兩次會議討論容共問題，但多數份子多對共黨之真誠表示懷疑。如會議主席謝持主張「黨中不可有黨」（註34），張繼主張「本部自應仍設在上海，不可移粵」（註35），另外彭素民，呂志伊等都表反對（註36）。

孫中山對於上海同志的疑慮，乃派廖仲愷前往解釋。上海本部的老同志們經廖之解說及基於對孫中山之信賴與服從，對於容共政策遂不再有異議，但後來孫中山逝世後，他們卻成爲西山會議派的反共黨人。

另外，民國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率同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等赴俄考察政治與軍事。蔣回國後，即向孫提出了「遊俄報告書」（註37），陳述此次赴俄考察之印象。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蔣復自滬到粵，向孫面陳其對容共之意見，尋又返滬。三月二日蔣氏在其致孫的信中透露他對改組的意先說：

「吾黨自去歲以來，不可謂非新舊過渡之時期，然無論將來擴張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殺此舊日之系統。何況新勢力尙未擴張，且其成敗猶在不可知之數，豈能置舊日系統於不顧乎」（註38）？

由此可見蔣氏對聯俄容共之疑慮，可是蔣氏的看法並未爲孫中山所採納，其未採納之原因，蔣氏於翌年三年後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坦誠的敘述：

「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國父認爲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



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註39）。

綜觀國民黨員對容共的態度，雖有部份黨員反對，但意見又頗不一致。而最後決策者在孫中山，故孫在決定聯俄容共時，反對者因為表示對孫之服從，只有不再堅持己，而讓孫乾綱獨斷了（註40）。

第二節 共產黨對加入國民黨的疑懼

中共於民國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西湖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後，不到一個月，因馬林到中國來要求中共委員再開會討論加入國民黨的組織。根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有如此的敘述：

「於是共產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二）遂決議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註41）。

「大會散會後，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議決案為言，於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已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註42）。

由這段話可知，中共中央的五位委員李大釗、張國燾、蔡和琳、高君宇和陳獨秀原來都反對加入國民黨的，他們反對的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註43）。但是由於第三國際的命令要他們加入國民黨，中共因為是蘇俄扶植成立的，羽翼未豐，因此只有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而加入國民黨。

第五章 孫、越宣言的發表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蘇俄特使越飛因與北京政府的外交談判破裂，乃自北京到滬，時孫中山亦因陳炯明之叛而避滬，越飛乃與孫中山直接談判聯俄容共的問題，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除肯定俄國放棄在東北及外蒙等地的特殊權益外，關於聯俄容共問題有下列的敘述：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不能引用於中國．．．止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要急之問題，乃在於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註44）。

此宣言發表後，越飛因病赴日本熱海調養，孫中山派廖仲愷同往，對聯俄容共的細節有進一步的磋商，越飛強調，蘇俄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註45）。



孫、越宣言發表後不久，陳炯明被桂軍逐出廣州，孫中山得以再回廣州，重建革命基地。民國十二年八月，派蔣介石率團到蘇俄考察政治和軍事。是年九月，鮑羅廷抵，十二月，孫中山截留粵海關關餘，英、法、美、日、義、葡等國派遣軍艦至廣州進行示威(註46)，孫中山乃公開聲明：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註47)。

第六章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聯俄容共的完成

孫中山自民國十一年秋決定聯俄容共後，即允許中共份子加入國民黨，並使其參與國民黨的活動。中共領導份子最早參與國民黨黨務的是陳獨秀，他於民國十一年九月六日被孫中山指定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之一，但他並未加入國民黨。其後林祖涵、張春木、李大釗等人都先後加入了國民黨。另一方面，蘇俄的代表鮑羅廷於民國十二年十月六日抵達廣州，一方面向孫中山表示願為國民革命效勞，一方面與廣州的共產黨人譚平山等有所聯絡。時孫中山既已決定借用俄國的經驗，改組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命廖仲愷、汪兆銘、張繼、戴傳賢、李大釗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負責辦理改組事宜。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於廣州高等師範學，出席代表一九〇人，前後開會共十天，會中討論容共問題，黃季陸反對容共，但因附議者少，案子沒能提出。方瑞麟提議反對跨黨，李大釗起而答辯，謂「共產黨是想對國民革命運動有所貢獻才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雖不敢說有多大貢獻，必然無損而有益。」並謂：「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曾允許共產黨而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行動」(註48)。汪兆銘、廖仲愷、胡漢民等也都沒有把跨黨問題看得太嚴重，主張以紀律來約，結果中共在允許跨黨的情況下，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終於成為事實。

第七章 結語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採行，實在是民國初年以來環境的趨向及時勢的促成。因民國初年軍閥的混戰，導致國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到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國內知識份子思想的變動，造成社會主義思想的風靡，而此時又逢蘇俄革命成功，正



想貫徹其世界革命的馬克斯思想，中共遂於民國十年在蘇俄的扶植下誕生了。蘇俄由於革命成功不久，爲了爭取中國的承認及進行其侵略中國之企圖，乃連續對華發表友好宣言，使得國人對俄國的仇恨漸漸友好。所以在聯俄容共的前夕，整個社會環境都 在這種友俄及社會主義思想瀰漫的環境中，又巧逢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失去了地盤和武力，遠走上海。當此孫中山孤立無援，苦無良策之時，蘇俄正因在東歐進行共產主義獨立活動遭到挫折而轉變策略，進行與他黨聯合的世界革命。蘇俄在中國與其他軍閥勾結失敗後，遂對孫中山伸出友誼的雙手，孫中山在那艱困的處境下，經過一番思考後，終於決定聯俄。而蘇俄扶植下的中共，因正逢鐵路工人罷工的群眾運動失敗，終於在蘇俄的命令下加入了國民黨，使聯俄容共成了事實。

在聯俄容共的過程中，雖然有一些反對的份子，但是終因一方面爲環境所逼，一方面缺乏決策之權力，終於只構成聯俄容共過程中的一段插曲而已。但他們在容共後的歷史中，卻形成一股政治暗流，沖擊著往後的中國政治。

〔註 解〕

註1：見謝見堯。「論早期蘇俄扶植中共及其對國民革命之影響」。革命思想，四十二卷六期，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台北。

註2：司馬長風。中國近代史輯要。香港，創作書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一二七～



一三二。

- 註3：沈雲龍。「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三十二卷二期，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台北。
- 註4：見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
- 註5：張玉法。中國近代史，下冊，台北，東華，民國六十六年，頁三七二～三七三。
- 註6：同註5。
- 註7：見東方雜誌，十八卷四號。
- 註8：戴季陶。「我的日本觀」，建設雜誌，一卷一號。
- 註9：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運動，台北，正中，民國七十二年。
- 註10：引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二冊，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五四八。
- 註11：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台北，東華，民國六十六年，頁三七〇。
- 註12：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台北，中國學術獎助會，民國五十五年，頁九四～九六。
- 註13：民國八年及九年。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先後向我發表宣言，聲言放棄帝俄時代在華特權。
- 註14：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八八。
- 註15：同註14。
- 註16：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三六，附錄二，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
- 註17：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八一。
- 註18：見鄧家彥。「馬丁謁總理實紀」，革命文獻，第九輯，總一四〇九頁。
- 註19：同註1。
- 註20：見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六年，頁二五。
- 註21：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冊，頁三八八～三八九。
- 註22：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三七。
- 註23：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九八。
- 註24：同註23。
- 註25：見革命文獻，第八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羅家倫主編，頁四六。
- 註26：據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頁三七八，中共在一九二一年罷工四十九次，參加罷工者十餘萬人，一九二二年有罷工九十一次，參加罷工者近十四萬人。由此可見群眾運動之一斑。
- 註27：見郭華倫。中共史論，上冊，頁六四。原文出自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
- 註28：轉引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六四～六五。原文出自陳公博著寒風集，甲頁二二二。



- 註29：見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台北，民主潮月刊社，民國四十八年，頁三～五〇。
- 註30：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九。
- 註31：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二二六～二二七。
- 註32：同註31。
- 註33：同註31。
- 註34：同註31。
- 註35：同註31。
- 註36：同註32。
- 註37：蔣之遊俄報告書大致為介紹蘇俄之紅軍組織及政治。
- 註38：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第六冊，香港，龍門書店，民國五十四年，頁一三。
- 註39：見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二五～二六。
- 註40：見司馬長風。中國近代史輯要，香港，創作書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一二七～一三二。
- 註41：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四五。
- 註42：同註41。
- 註43：見劉珍。中共史綱，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四年），頁三七。
- 註4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冊，頁三八二。
- 註45：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七四。
- 註46：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台北，商務，民國五十九年，頁一〇八二～一〇八四。
- 註47：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冊，頁三八二轉引。
- 註48：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一二九，附錄二：「李大釗對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參考書目〕

1.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獎助會出版，民國五十五年。
2.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六年。
3. 司馬長風。中國近代史輯要，香港，創作書社，民國六十七年。



4. 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
5.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二年。
6. 鄭學稼。中共興亡史，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
7. 孫中山。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民國六十二年。
8.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六年。
9.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香港，龍門書店，民國五十四年。
10.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台北，商務，民國五十九年。
11.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四十八年。
12.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台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四年。
13. 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集，第十輯，國共鬥爭，台北，聯經，民國七十一年。
14.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七~九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一年。
15.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六十一年。
1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弘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
17.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五十四年。

〔相關論文〕

1. 饒立風。「聯俄容共始末」，華夏學報，第五期，民國六十年十月。
2. 陳果夫。「北伐前後一段黨史」，藝文志第五〇~五一期，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及五十九年一月。
3. 謝信堯。「論早期蘇俄扶植中共及其對國民革命之影響」，革命思想，第四十二卷第六期，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4. 劉紹唐。「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民國六十七年二月。
5. 李雲漢。「從聯俄容共到絕俄清黨」，傳記文學，第三十三卷第六期，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